

试议“子”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

王红生¹,张瑜²

(1.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2.宝鸡文理学院 杂志社,陕西 宝鸡 721016)

[摘要]汉语“子”后缀化为名词标记固然跟其词义虚化相关,但这种虚化决非起主要作用,虚化的结果只是产生个备用的供以选择构词的材料,而起根本作用的是根词的历时演变。语言学的单位问题,对诠释根词的历时机制,至关重要。这主要表现在根词演变的必要条件是共时中根词实现在不同言语链上的既具同一性又有差别性的不同言语单位,而演变过程则是这些既具同一性又有差别性的言语单位在历时中对立化的过程,至于名化标记“子”只是这种对立化的手段。人类语言演变呈现为一个倾向趋势,即范畴所包含的非原型或典型成员容易标记化,汉语根词包含的非原型或典型言语单位的标记化,也符合这个趋势,而“子”的名词标记化也符合这种演变趋势。

[关键词]名化标记“子”;相对任意性;语言学的单位;非典型成员标记化;历时机制

[中图分类号] H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8)06-096-07

一、引言

汉语“子”起初是个义为“子女”的实词,后来在历时演变中逐渐语法化成个后缀。若用“X+子”表示汉语以“子”为后缀的构词形式,据现代语法学分析,其中“X”是词根语素,“子”是词缀语素,而从历时演变说,前者是根词“X”语素化的结果,后者则由实词“子”语法化而来。作为汉语典型的词缀,“子”不仅没有词汇意义,而且语音上轻化,这两方面都跟与之共存的实词“子”有原则区别。那么,实词“子”是如何语法化成后缀的?

目前来看,这仍是个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对此再作以讨论。

前贤对实词“子”后缀化的探讨没少涉及,而这些探讨主要围绕“子”本身在演变中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或倾向认为“子”自身变化对其语法化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比如,王力认为,意义变化是“子”后缀化的基础,^{[1](P223-224)} 这种看法奠定了

此后汉语学者从词义虚化角度分析“子”后缀化的基本格局。至于“子”能指变化的原因,人们的解释也主要基于这种格局,即能指变化决定于所指变化,“子”的轻音化也由“词义的虚化”引起。^{[2](P99)} 认知语言学兴起后,已有人使用这种语言学的理论及方法,对“子”的后缀化做过再分析^[3],这种分析能体现新时期人们更为深入的探讨。本文以为,“子”的后缀化固然跟其自身词义的演变相关,但将论述视域仅仅或主要限止在“子”的词义演变上,至少很不全面,至于后缀“子”没有词汇意义、语音上轻化的特征只是“子”语法化的结果,这虽能构成“子”后缀化的一环,却不是其语法化完整过程的反映。

赵元任认为,后缀“子”具有“名词化的作用”,^{[4](P122)} 本文据此将这种后缀称作名化标记。这是说,标记“子”在汉语历时演变中,具有使某些实词(即根词X)名化的语法价值,如“剪”本是个动词,在其后加个标记“子”所成的“剪子”却是名

* [收稿日期]2018-09-14

[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校级项目:范畴边界及关中方言程度副词的历时来源(项目编号:ZK2017016)。

[作者简介]王红生(1979-),男,陕西大荔人,文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理论及汉语史;张瑜(1985-),女,陕西洛南人,文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杂志社编辑,研究方向:汉语史。

词。“子”这种标记类似印欧语的语法形态,它能用以标志汉语名词语类。所以,王力曾把后缀“子”归入他说的“广义形态”,并认为这种“形态”是划分词类的重要标准之一。^{[5](P358-363)} 我们以为,无论是标记“子”在历时中所起的名化作用,还是在共时中具有的区别语类功能,都说明标记“子”的产生主要是汉语语法推动的结果。

本文的论述将表明,“子”自身的演变只是使其成为名化标记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子”只是被动地供以选择的构词材料,而这种选择起根本作用的则是根词的历时演变。

二、“子”的音缀化及“X+子”的创制理据

“子”后缀为名化标记的必要条件是,它在历时演变中的音缀化,即“子”演变为一个后附的纯粹表音成分,而这种音缀化是“子”在表义上彻底虚化的结果。“子”自身的意义特征制约和决定着其发展流向,而其“小称”义则是引发其彻底虚化的关节点。王力曾指出,实词“子”诸义项中,其“小称”义应是“子”“词尾化的基础”。^{[1](P223-224)} 古代训诂材料能提供这种“小称”义解释的佐证,如东汉的刘熙在《释名·释形体》中释“瞳子”的“子”为“小称也”。“小称”义因有“小”的特征,它往往跟“可被忽略”“可被忽视”“可被轻视”等概念紧密相联,前者会派生出后者用法,如“黑子”“婢子”“奴子”等概念都有“可被忽略”“可被忽视”“可被轻视”等特征。其中,“黑子”是视觉上因形体小而容易被忽略的,“婢子”“奴子”则是阶级社会中因地位卑微而被忽视的。“小称”义语词的这种演化趋势可在跨语言中得到验证。比如,英语的后缀-ling有“小”义,如 duckling“小鸭”、gosling“小鹅”、fledgeling“小鸟”等,这种“小”义的一-ling也派生出表“可以被轻视”的用法,如 weakling“弱者”、princeling“小王子”、hireling“雇佣”等。^{[6](P73)} “子”的“可被忽略”“可被忽视”“可被轻视”等意义的下一步走势便是在所指层面完全“被忽略”,最终演变成个所指空无的纯粹音节,这就是后缀“子”的构成材料。

汉语每个字往往“关联着一个概念”,“是有意义的”,^{[7](P246)} 这是一般情况。在汉语“字群”中,后缀“子”像个异类,它只是个纯粹音节形式,并不代表什么具体概念或意义,跟其他自主字词比较,后缀“子”并不自主,它只能附在词根语素后构成语言符号“X+子”来表达特定概念或意义。跟解

释其他虚化成分所基于的历时视角不同,我们无法据语法化的“保持原则”^[8] 从后缀“子”身上探取到它从其语法化源头继承来的某些滞留特征。符号“X+子”的能指由词根语素 X 的音节形式再附个词缀“子”的音节形式构成,基于后缀“子”纯音节性质,“子”准确地讲,应该是符号“X+子”的音缀。在本文看来,谈论汉语后缀“子”的认知前提是,将这个后缀看成“X+子”的音缀,将它置于能指层面去考虑,在语言符号相关理论框架下,我们才有可能较为深入地讨论音缀“子”的特殊价值,以及汉语“X+子”这种符号的创制理据。

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语言符号的能指是声音,所指是意义,而语言是由众多音、义结合的符号通过关系组成的系统。语言符号的典型是词,而“X+子”是创建汉语这种典型符号的一种模式。“X+子”能指中包含一个比 X 多出的无所指的音缀“子”,这种能指模式及其能指成分音缀“子”的存在理据,由围绕在能指周围的各种语言关系决定。语言的本质是关系,这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的理论观点,^[9] 对能指理据性的寻求要依赖这种本质。围绕在语言符号能指周围有两种紧密联结的语言关系:一是语言符号内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语言符号的声音和意义不能分离,前者存在的理由在于表现后者,而符号创制是声音和意义交互作用的结果。索绪尔以为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具有任意性,并指出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10](P102-105)} 拙文曾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及其理论效能做过比较详细的讨论,^[11] 将这种观点用在分析“X+子”是说,“X+子”中根词 X 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另一种重要关系是不同语言符号间能指的对立关系。能指彼此相互区别便构成各自的价值,这种对立价值用以标志不同所指。比如,普通话中“剪子”的根词“剪”和“拍子”的根词“拍”的能指不同,能指彼此区别便构成各自价值,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所指。这两方面涉及的能指基本以汉语单音节为主,而且决定这些能指形式的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X+子”的创制理据也以这种任意性为基础。

人们常将任意性和理据性对立起来,而将索绪尔说的“任意性”解释为无理据性。其实,索绪尔的“任意性”也包容一定理据性,这表现在他对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区别和联系的论述上。^{[10](P181-185)} 概括地说,“绝对任意性”是就不可

切分的最小符号说的,这些符号音、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无理据可言,这是符号任意性的基础,而“相对任意性”是就由多个下位的、更小的形式通过关系组成的符号说的,这种关系决定语言中一部分符号具有可论证性。一种语言纯按绝对任意性原则创制它的符号,势必要为各种意义或概念创制数量难计的符号,这实难办到,实际情况是每种语言总有一部分符号有理据可讲,而这种理据则受制于相对任意性。相对任意性是索绪尔基于语言的本质是关系这种语言观提出的,跟一般理据不同,这种任意性的可论证性是指关系的理据。^[12]汉语“X+子”的创制理据便基于这种相对任意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X+子”的创制基于它跟根词 X 既对立又联系的关系。“X+子”的创制是在根词“X”后添附个音缀“子”以延长能指的长度,这个音缀并不表示什么具体意义,只在构成符号有区别的能指(即“X”“X+子”)并标志两种对立价值,用张世禄的看法就是表意义的对立,^{[13](P71-79)}如“种:种子”“剪:剪子”等。不止如此,各组词内部两个相对语词也相互关联,它们不仅在共时中包含共同成分,如“种”“剪”等,而且历时中每组词中都是前者派生后者,如“种子”是从“种”派生、“剪子”是从“剪”派生等。

另一方面,“X+子”体现了汉语名词语类的形式化和标记化,其创制理据也基于语法的聚合关系。词类或语类的实质是词语在语法上的类化,而这种类化则基于词语语法的聚合关系。在聚合关系支配下,汉语创制了一批以“子”为标记的名词性符号,如“种子”“擦子”“拍子”等,标记“子”使这些语词符号聚集在一起,并标志这些语词同属汉语名词语类。这两方面的关系都使汉语形式“X+子”的创制有理据可论。

三、“子”名词标记化取决于根词的演变

“子”自身意义的虚化还够不上其后缀化为名词标记化的充分条件,而汉语选择“子”作为后缀的名化标记多少带有偶然性,即汉语通过延长能指长度来标志语词对立所用的音缀并不限于“子”,理论上还可以选择别的音缀,只是“子”自身的持续虚化满足这种纯粹音缀化的要求,但是,满足这种要求还不够,虚化的结果只使“子”成为纯粹表音成分,而要使这种语音材料扮演特定的语法角色,即让它成为后缀的名化标记,则决定于汉语语法的发展需要像“子”这种语音材料来表示语

词间价值的对立。人们常认为,“X+子”由根词 X 派生,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按本文看法,“X+子”是根词 X 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替代形式。这种形式是在根词 X 后附个已音缀化或趋于音缀化的“子”构成,而音缀“子”是被动地为根词 X 选择结合的形式,并被注入名化标记的语法价值。所以,“子”后缀化为名词标记化决定于根词 X 的演变,只有根词 X 的演变,才会产生“X+子”这种替代形式,才会使音缀“子”这种声音材料注入特定语法价值。据此而论,要探讨“子”后缀化为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就不能将眼光只放在“子”自身的演变上,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根词 X 的历时演变,弄清根词 X 的历时演变才能有效解释“子”后缀化为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

汉语“X+子”中根词 X 的分布范围主要有三类词,它们分别是动词(V)、形容词(A)和名词(N),其用例分别如下:

I.V-子:种子、擦子、拍子、骗子、探子、垫子、扣子,等等;

II.A-子:辣子、乱子、疯子、傻子、呆子、胖子、矮子,等等;

III.N-子:刀子、青雀子、车子、手帕子、妃子、姑子,等等。

这三组词中,III中根名词 N 后附“子”所成的“N-子”仍是名词,这种“子”是比较单纯的名词标记,即 N 已然是名词,而汉语为凸显这些名词的语类属性,特用个已语法化的名词标记“子”来标志。与 III 中的“子”有所区别,I、II 中的“子”在共时中是“V-子”“A-子”的名词标记,历时中则有另一种重要功能,那就是使作根词的动词或形容词名词化。例如,“种”“辣”本是动词或形容词,其后附个“子”所成的“种子”“辣子”则是名词,其中,“子”在共时中是个名化标记,历时中动词或形容词“种”“辣”则通过添附它名词化。汉语有着比 III 型为数更多的 I、II 型的“X+子”,这两型实例也表明,作为中介的标记“子”不仅连接着两个相关概念(如“种”和“种子”、“辣”和“辣子”等),而且具有使其中一个概念转化为另一个概念的重要作用。本文将论述重点放在 I、II 型的名化标记“子”的形成机制上。这种论述将表明,I、II 型中名化标记“子”的形成,取决于其中作为根词的动词或形容词的历时演变。较为详密地考察这些动词或形容词的历时演变,才能搞明白它们演变过程中为何会在其基本形式后添附个“子”来

构制新符号。

语言存在共时和历时两种时间态,前者是特定时期的语言状态,后者是语言由一个共时态向另一个共时态的演变发展。索绪尔告诫学者,把这两种时间态“杂糅在一起进行概括是荒谬的。”^[14]我们曾对此指出,共时、历时的“分”或“合”关键看它们有无实质区别,实则它们是两种有根本区别的语言时间态。^[15]另外,共时、历时的区分不意味它们毫无关联。具体说,共时研究是历时研究的基础,不对共时作深入研究,也无法理解历时演变的实质及变化程度,这也是索绪尔认为共时研究比历时研究更重要的原因。^[16]将这些观点用在本文论题上是说,要深入研讨决定“子”名词标记化的主要原因,我们有必要对作为根词的动词或形容词的共时状况有所了解。这些情况为这两种词的历时演变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子”附缀其后提供了可能。

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是缺乏形态变化,这种特点赋予汉语动词或形容词在共时中一个基本事实,即隶属这两类词的某个特定词出现在不同话语链的不同句法位置上形式一致。特定动词或形容词每出现在一种话语链中,会占据一种个别和具体的句法位置,而这种动词或形容词的可能演变则受制于其在共时中所处的不同话语链,即这些话语链施加给特定动词或形容词一定的差别性,为其演变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所能出现的句法位置上,汉语动词和形容词展现出许多语法共性,而特别有益说明本文论题的是这两类词出现在两种话语链中所占据的句法位置。这两种话语链分别是特定动词或形容词作谓语的话语链和这个动词或形容词作主语、宾语的话语链。为方便论述,这里用大写的 X 表示汉语共时中某个特定动词或形容词,用 P_1 、 P_2 分别表示 X 能出现的两种话语链,而用小写的 x_1 、 x_2 分别代表 X 在这两种话语链中的实现形式。如下所示:

P_1 :…… x_1 (作谓语)……

P_2 :…… x_2 (作主语或宾语)……

这两种话语链中同属 X 的 x_1 、 x_2 存在差别性。比如,在句法位置上, x_1 作谓语的位置可看作 X 能出现的“典型”位置,而 x_2 作主语、宾语的位置可看作 X 出现的“非典型”位置,因为从语法意义上看,作谓语的 x_1 表达了动词或形容词 X 的典型意义,即表动作行为或表事物的性质、状态,而作主语或宾语的 x_2 却表达了动词或形容词 X 的

非典型意义,它具有指称动作行为或表事物性质、状态的特征。所以, x_2 跟名词有某些共性。基于此,过去有种“名物化”学说。这种学说认为,X 的 x_1 变成 x_2 后 X 的词性便会发生改变,而“当名词用”“名物化”“名词化”了。“名物化”学说自身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对汉语的历时状态说,“名物化”指出 X 包含的 x_1 、 x_2 存在差别性,却对研究 X 的演变极为重要。按本文看法,X 包含的 x_1 、 x_2 的差别是 X 演变的共时必要条件,即 x_1 、 x_2 存在差别性不意味 X 一定演变,但 X 的演变却以这些差别为前提条件。本文将基于这种差别性对作根词的动词或形容词 X 的历时演变做以概要式论述,而“子”后缀化为名化标记,无非是由动词或形容词 X 的历时演变催生新形式的过程。

四、“子”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

语言学的单位问题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语言学的单位问题一旦得到回答,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17](P315-316)} 汉语诸多重要问题都跟单位问题相关。比如,朱德熙等剖析“名物化”说所存在的问题时提出“个体词”“概括词”两种语法词,所谓“个体词”是词出现在特定语言片段中的“词的个体”,“概括词”是有着同一性的“词的个体”的“集合”,并且“概括词”是从“个体词”抽象综合来的,而“个体词”是“概括词”“实现”在具体语段中的个别表现形式。^[18] 朱先生后来将“概括词”“个别词”分别改称作“类象词”“具象词”,^{[19](P83-86)} 其精神实质一致。

我们曾进一步认为,“概括词”属语言层面,“个别词”属言语层面,语言学的单位有必要基于语言和言语这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平面而别为“语言单位”“言语单位”两种。

具体说,言语单位是从言语链条中直接切分出来的,而语言单位则是据语言价值的同一性将切分下来的言语单位概括出来的抽象单位;言语单位间体现为绝对差别性,而语言单位间则体现为价值的对立性;每个语言单位类似一个数学集合,这个集合包括若干价值具有同一性的言语单位,而言语单位则类似这个集合的元素。^[20]

此后,我们对语言学的单位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21] 需要补充,语言价值是切分和归纳这些单位的标尺,它决定了言语单位价值的同一性和对立性,以及由此决定了言语单位归属同一或不同语言单位。语言价值理论的开创者是索绪

尔,这种从经济学中汲取养分而创造的新型理论以为语言价值由语言的关系本质决定和规定。^[22]索振羽的论文^[23]、徐思益的文集^{[24](P370-390)}等,对语言价值有过详细研讨,可供学者参考。

单位问题在语言两种时间态及其关联的研究中,居有重要地位,而本文对“X+子”中根词X演变所需的共时条件及其历时演化过程的论述,便围绕单位问题展开。

将上面理论观点用在分析“X+子”中作根词的汉语动词或形容词X及其实现在不同言语链中的形式是说,共时中同样的X实现在如上文所示的不同言语链 P_1 、 P_2 等中的个别形式分别为 x_1 、 x_2 等,大写的X是语言单位,这种单位相当于一个集合,而其实现的个别形式、小写的 x_1 、 x_2 等,则是隶属语言单位X的言语单位,这些言语单位相当集合X的元素,可将这两种单位的关系表示为“ $X = \{x_1, x_2 \dots\}$ ”,其中, x_1 、 x_2 等是既有差别性又有价值同一性的不同言语单位,它们因价值同一性而归属同一语言单位X。根词X的历时演变,便围绕这两种单位进行,即从共时说,语言单位X包含诸多有差别的言语单位 x_1 、 x_2 等,是这个语言单位演变的必要条件,而从历时说,语言变化起于言语,X的历时演变无外是其在共时中,包含的言语单位 x_1 、 x_2 等重新确立同一或对立关系的过程,其演变结果便是导致使用新形式或能指来标志代表新价值的新语言单位的产生。这种演变原理我们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论述,^[16]而前文所述的作根词的动词或形容词X这种语言单位在共时中所囊括的两种言语单位 x_1 、 x_2 跟“子”的发展命运相关。

前已论及,作根词的动词或形容词X包含的言语单位 x_2 不及 x_1 典型,却跟名词指称事物的典型特征相通。例如,形容词“辣”在“饭菜辣得很”“喜欢辣”两个言语链中有差别,前者中的“辣”由于作谓语表达了“饭菜”的性质状态,后者中的“辣”由于作宾语而用以指称性质状态,这是语言单位“辣”包含的言语单位间的差别。共时中 x_1 、 x_2 虽然有这种差别,但是,汉语社群心理上,还是将它们当成相同语言单位X,而在历时态中,这种差别将对X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即 x_1 、 x_2 在历时中分头行动,它们的差别可能会上升为对立,这种情况下汉人族群不再将 x_1 、 x_2 看成具有价值同一性的言语单位,而看成价值对立的语言单位,其结果就会用区别形式将这种对立确定下来,即“任

何观念上的差别,只要被人们感到,就会找到不同的能指表达出来”。^{[10](P168)}为建立能指或形式的区别,才有可能用到“子”这种音缀形式。

本文以为,催生“X+子”这种形式的历时动力在跟名词一样具有指称特征的言语单位 x_2 的语言单位化,即 x_2 从X中解放出来独立成个新语言单位,为了跟X在形式上区别开来,而采用个业已音节化的“子”作为后缀构成“X+子”的形式来标志新价值的诞生,进而促使“子”名化标记化。在 x_2 为“X+子”替代的历时过程中,汉语社群的心理变化及认知作用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根词X这个语言单位包含的有差别的言语单位 x_1 、 x_2 在共时中具有价值同一性,汉语社群心理上认为它们是同一单位,但历时中汉语社群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而认为言语单位 x_2 跟 x_1 等其他言语单位不同,应是对立的语言单位,这种心理变化导致汉人在言语单位 x_2 后附个音缀“子”形成“X+子”以造成形式区别,并用这种区别形式来标志对立的價值。索绪尔语言学包含着浓重的心理主义的观点,其实,语言的存在和发展跟语言社群的心理密切相关。^[25]其次,汉语之所以在言语单位 x_2 而不是在 x_1 后添加名化标记“子”形成“X+子”,受制于人类的认知能力。人类的认知功能决定语言演变普遍呈现为这样一种特征,即语言范畴的原型或典型成员往往是无标记的,而非原型或典型成员则容易标记化。一般说,谓语是汉语动词或形容词出现的典型位置,而主语或宾语则是这两种词出现的非典型位置。“X+子”中作为根词的汉语动词或形容词X是个特定认知范畴,这个范畴内包含若干成员 x_1 、 x_2 等,它们具有价值同一性的同时,也具有典型程度的差别。其中,作谓语的 x_1 是X的原型或典型成员,而作主语或宾语的 x_2 则是X的非原型或典型成员,据人类语言演化的普遍趋势,汉语历时演变中应是 x_2 而不是 x_1 倾向标记化,实际结果也符合这种趋势。从儿童习语过程看,无标记成分一般易学并让儿童先学会,而有标记成分则相对难学并为儿童后学会。比如,汉族儿童一般学有标记的“辣子”要比无标记的“辣”难,先学会“辣”然后才学会“辣子”,如孩子看到桌子上碗里的辣子时,习语过程中会先说“辣不要”“不要辣”等,后来才学会说“辣子不要”“不要辣子”等。汉语社群的心理变化及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子”名词标记化的历时机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五、余论

综上所述,汉语“子”的名词标记化不应仅仅或主要看作其词义虚化的结果,而是语法起根本作用。语言学者常将语言别为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但语言实情并不允许这样分割。实际话语中每个音、义结合的语词总表现在言语串上词与词的结合关系中,这种关系为每个语词的语法演变提供了必要条件。“子”名词标记化的推力在于其所依附的根词的历时演变,而演变的必要条件是共时中根词在不同言语链中的差别性,这种差别来自根词占据的句法位置的特殊性,如能占据的谓语跟主语或宾语的差别。根词包含的有差别的言语单位一旦被重新分析为对立单位,语言历时机制将会促使形式对此有所反应,像“子”这种名化标记才会产生,甚至“子”后来的语音轻化也来自这种机制。

“子”的名词标记化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语法形态的认识。一般论作将构词、构形区别开来,认为构词要论词内部构成成分的结合关系,构形要说词的形态变化。汉语缺乏像印欧语那样的狭义形态,我国学者受此形态说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了“广义形态”的说法,如本文开头提及的王力所说的“广义形态”,除了包括像印欧语那种狭义形态,还包括像汉语“子”这种词缀。^{[5](P358-363)}与此不同,方光焘认为,“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26](P4)}这种“广义形态”将构词、构形、词与词的结合关系统一起来了,而所谓狭义形态实是词与词关系的外部表现。名化标记“子”集中体现了这种统一关系。这个标记不只是所谓后缀,也像是印欧语那样标志特定词类的形态,更是将根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如谓语和主语或宾语)的言语单位对立化的手段。这些说明,名化标记“子”注定跟特定句法位置相连,并体现特定的句法关系。

参考文献

- [1]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江蓝生.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M]//汉语语法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3] 高航.现代汉语中“子”的语法化分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02):11-16.
- [4]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5] 王力.王力选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6]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7] 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8] 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04):17-24.
- [9] 王红生.论语言的本质[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91-95.
- [10]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1] 王红生.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及其理论效能[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102-106.
- [12] 王红生.试论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性[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271-275.
- [13] 张世禄.因文法问题谈到文言白话的分界[M]//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14] 信德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J].国外语言学,1993(04):8-17.
- [15] 王红生.施向东.评几种质疑共时和历时划分的语言学观点[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6):148-153.
- [16] 王红生.德·索绪尔的语言演变理论[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79-86.
- [17] 于秀英.索绪尔的启示——代译后记[M]//普通语言学手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8] 朱德熙,卢甲文,马真.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04):60-64.
- [19] 朱德熙.语法分析讲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20] 王红生.汉语语法分析的两种单位[J].殷都学刊,2015(03):95-99.
- [21] 王红生.语言学的单位问题[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05):120-127.
- [22] 王红生.经济学视野之下的语言学[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462-467.
- [23] 索振羽.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02):123-129.
- [24] 徐思益.语言研究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5] 王红生.正确理解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J].武陵学刊,2015(06):109-114.
- [26] 方光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责任编辑 刘林魁)

Discussion on the Diachronic Mechanism of Noun Lexicalization of “zi”(子)

WANG Hong—sheng¹, ZHANG Yu²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Shaanxi;

2.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6, Shaanxi)

Abstract: The change of Chinese “zi”(子) from word to suffix is certainly related with meaning blurring, but the blurring does not play a major role. The result of meaning blurring is only to produce an alternate word—formation material to be selected. What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s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root words. Linguistic unit problems a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explain the diachronic mechanism of root—words. This means tha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oot—word change is the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of parole units included from specific root—word in the synchronic state, and the root—word change process is the antagonistic process of identical and different parole units. As for the nominalization marker “zi”(子), it is only the antagonistic method. Besides, human language change shows a tendency that non—prototype or typical members of category are lexicalized easily, and the lexicalization of Chinese non—prototype or typical members of root—word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tendency from which the noun lexicalization of Chinese “zi”(子) is produced.

Key words: nominalization marker “zi”(子); relative arbitrariness; linguistic units; lexicalization of non—typical members; diachronic mechanism

(上接第 81 页)

[2] 释皎然.诗式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

[3]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王晓玲.清代《史记》文学阐述中“实录”文学意义的转换[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93-96.

(责任编辑 张福安)

Wang Fanzhi's Poetic Interest and Its Enlightenment

YANG Xiao-hui, FU Man-ge

(School of Literature,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Shaanxi)

Abstract: The most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Fanzhi's poems are “trueness” and “vulgarity”. His poems reveal the true heart, reflect the real world, and comfort the common life, which have positive social value at that time and now. Wang Fanzhi's poems pursue the true self, the harmonious life, the pleasure and good deeds, have a harmonious family view and transcendent outlook on money.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orld to settle down and make a living, and also the source of pleasant life. The purport and interest of his poems have shin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pread abroad, and have grea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us.

Key words: Wang Fanzhi's poetry; popular literature; realistic enlightenment